

海南黎、汉贸易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一个历史的考察

宋 浩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00

摘要：民族间贸易是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宋代是海南黎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这得益于大陆上大量以汉族为主体的人民因战乱或其他原因南迁海南岛，为海南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技术、劳动力和资金，同时也是黎族人民勤劳奋斗的结果。宋代黎、汉之间的贸易体现出品类更丰、总量更大、范围更广的特征，随着黎汉贸易的发展，黎、汉民族的交往更频繁、交流更深入、交融更紧密，逐渐在命运上具有了休戚与共的特征。

关键词：黎族；宋代贸易；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

引言：黎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主要居住在海南岛上。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黎族人口1463064人，其中海南的黎族人口为1277359人，约占黎族人口总数的87.3%。黎族的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学界对“三亚人”遗址的挖掘，发现早在一万多年前，海南岛上就有人类居住和活动。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的殷周时期，黎族的远古先民就开始开拓海南岛。据各方面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黎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南方的越族，与“百越”中的一支——骆越，关系密切。黎族与中原各族的经济交往早在商周以前便开始了。据《史记·武帝本纪》记载：“（禹）定九州，各以共职来贡……南抚交趾。”这可以视为岭南越族与中原各族最早的交往。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也记载：“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这反映的是黎族先民向中原民族进贡纺织品的历史。随着中原王朝不断扩展自己的版图，不断向南方辐射影响力，黎族与中原各民族的交往也相对增强。总体来看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中原王朝与海南的关系时紧时疏，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陆政局的不断变动，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关，正所谓“天高皇帝远”，南方各地远离中原权力中心，又因为经济社会开发程度尚低，经济交往，交通联系尚弱，因而出现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关系的微妙变动。魏晋以后，随着大陆长江流域以及更南区域的开发，南部边陲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交流、交融更甚。在唐代，随着国际贸易的繁盛，处于中国与西方海上贸易的中原关节点的海南岛，越来越受到中原王朝的重视。唐代继承隋代以来在海南加强统治的政策，力图将海南黎族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控之下，并积极开发

和经营海南黎族地区。唐代在海南设置了5州22县，奠定了后世行政建制的基础。元和二年（807年），琼管僮、振、万安6州62峒均已归附，这标志着中原王朝的势力日益深入黎族地区。在政治联系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大陆与海南岛经贸联系也日渐加强。海南岛上出产的珍贵物产，如珍珠、玳瑁、香料等也以所谓“土贡”的方式由商人从海南贩往大陆，如《新唐书》记载：“土贡：金、银、珠、玳瑁、高良姜”。随着黎、汉民族政治、经济的交往、交流，其民族交融之势也更甚。据《太平寰宇记·岭南道十三》记载，开元年间（713年—741年），海南全岛5州（琼、崖、儋、振、万安）共有11535户，其中崖州就有6646户，比当时大陆地区的雷州（4300）户还多。这些编户中，除了汉族还有一部分当地发展程度较高的黎族先民，汉代称之为“善人”。唐代岛上的汉族，有相当一部分是被贬谪而来的汉族官宦，有明确记载的宰相、大臣就有十余人之多。唐代著名宰相李德裕举家迁往海南，至今还流传着李氏后裔融入当地黎族的传说。唐末开始，大陆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动乱时期，而这对于远离冲突中心的海南岛来说却是一个发展的机遇期。随着大量人口的南迁，海南岛迎来了大量劳动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大量的生产资料以及相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的，于是在两宋时期，海南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岛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关系向前发展。本文将通过探究宋代海南黎、汉贸易来试图说明经贸交往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作用。

1 宋代黎、汉贸易的基础、内容与特征

1.1 宋代黎、汉贸易的基础

1.1.1 政治基础：羁縻政策与土官制度

两宋时期是海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黎族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黎汉贸易往来增多,民族交往频繁,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得益于大陆上中原王朝战乱频繁,大量汉民南迁,携带了许多生产资料至海南岛。如上文所言,在五代时期,大陆上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惟长江以南尚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于是大量汉族人民南迁,其中不少迁徙至海南岛。《新五代史》记载:“是时天下已乱,中原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避也,多游焉。”当时南迁的人民有的是宦宦,有的是商贾,有的是工匠,还有的是士卒与贫民,他们的到来,为海南岛的经济带来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资源,也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社会制度,于是海南岛的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黎族是海南岛上的重要少数民族,在宋以前数百年,中原王朝与黎族的交往、交流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了宋代,宋王朝为了加强对海南岛的掌控,开始探寻一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对黎统治政策。

宋朝对黎族地区的统治,主要是以所谓“顺俗而治”作为基本方略。对于黎族人民不服宋王朝统治的“扰边”行为,尽可能采用招抚的方略;对于黎峒之间的争斗,强调双方依照习惯法进行解决。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黎人“扰动”,琼、崖、儋、万四州都巡校使李崇矩“悉抵其洞穴抚慰,以己财遗其酋长,众皆怀服。”又宋真宗曾对一起黎峒冲突事件做出批示,曰:“朕常戒边臣无得侵扰外夷,若自相残杀,但用本土之法。苟以国法绳之,则必致生事。羁縻之道,正在此耳。”为了落实好宋王朝中枢制定的“羁縻政策”,他们还将驻琼官僚履职期间能否安抚好黎族人民作为对其评定赏罚的一项重要依据。如根据《宋会要·蕃夷五》记载:“乾道二年(1166年),十二月十四日,广南西路经略转运司言:欲行下琼管及三年守倅,多方措置,婉顺说与黎人,示以朝廷德意,归命使之自新,退复省地,如能说谕收复省地,黎人安恬,不引惹生事,量功效大小,立为典赏,任内有侵犯省地或失省民,亦重责罚。”宋王朝除了继承隋唐以来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还依照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方式,任用黎族峒首为土官,这些措施对于稳定海南黎族以及海南岛的政治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为黎汉经济交往和民族交融提供了政治基础。

1.1.2 经济基础:减轻赋税与农业发展

宋王朝对黎族的“减轻赋税”的经济政策以及大陆迁入海南岛的汉族人民带来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促进了黎族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这为黎汉贸易的发展以

及黎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经济基础。有宋一代,黎族农业取得了显著发展,尤其是在所谓“熟黎”地区。这种发展,一是因为黎族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增加。宋真宗时,占城(今越南中部地区)稻种传入海南,由于该稻具有耐寒、耐涝、早熟、抗病等特点,十分适合海南的气候与地形条件,占城稻种传入以后,海南的水稻生产由原来的“冬种夏收曰小熟,夏种冬熟曰大熟”的一年两熟,变成“自宋播占城禾种,夏种秋收今有三熟”的一年三熟,因而粮食总产量提升。除了稻米以外,该地区还种植有薯芋等品种的农作物,充实了黎族人民的粮食品类。二是因为黎族生产工具的改进。如苏轼及其子苏过在海南时的诗作中所提到的“耜”、“耨”、“耕牛”等生产工具在海南农业生产中的使用,又如考古学者在海南东方市古州镇发现了大量铁制农具,由此可以推断,当时部分黎族聚居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方式已经与中原地区相去不多。三是因为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如开宝八年(975年),琼州地方开修渠堰,引黎母山注入峻灵潭之水灌溉良田二百余顷。又在琼州府南置水车以灌溉田地。随着宋代海南黎族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黎汉之间进行商品贸易的需求和供给条件都得到改善,这位黎汉之间的贸易发展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

1.2 宋代黎、汉贸易的内容

海南岛上黎族对汉族的贸易物品,主要以香料、槟榔和吉贝等为大宗产品,也包含一些其他土产和手工业品。香料不仅是海南岛的重要产品,也是黎族人民的特色产品,黎族人民所采集的香料,其质量超过舶来产品,如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志香》中记载:“世皆云二广出香,然广东香自舶上来。广右香产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最盛……悉冠诸蕃所出,又以万安者为最盛”。赵汝适在《诸蕃志》中对海南香料的评价是“香谱第一”,“其货多产于黎峒”。宋代的史书典籍在对海南特产的记载中每每将香料列为首要,可见海南的香料在海南物产中的重要地位。由于香料的生产不易,海南香料的数量少而价格高,如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写道:“(沉香)海南自难得,省民以一牛于黎峒博香一担归,自差择得沉水,十不一二,顿时香价与白金等”。由于香料的这个特点,宋王朝在海南设置“香药院”,专门从事香料的征购,香料贸易带有官营的性质,但是由于香料贸易获利颇丰,甚至出现“十倍获利”的情况,于是也有部分民间私人性质的贸易。除了香料以外,槟榔和吉贝也是重要的贸易产品。槟榔既是一种药物,可以“消谷、除痰、辟杀三虫”,也是一

种零食,有些人“以槟榔为命”“顷刻不可无之”,在有些地区甚至还可以成为婚嫁之物,“富者用槟榔一百斤或三二十斤亦可,贫者用四两半,以为定亲之礼。”由于海南气候适宜槟榔生长,且市场需求量大,于是产销两旺,每年销往广东、福建等地的“不知其几千百万”,槟榔贸易的税收甚至可以占到海南商税的五成以上,“槟榔生海南黎峒,……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数万缗”。除了香料、槟榔和吉贝等农产品以外,黎族妇女的手工艺品“黎锦”、“黎单”、“黎幕”等也因外形优美、工艺精湛而受到市场的欢迎。

黎族与汉族之间贸易,从黎族方面来看,主要是用特色农副产品以及手工业品从汉族那里换回生产工具和一些生活用品。如苏过曾写道:“黎人处不毛之地,盐、酪、谷、帛、斤、斧器用,悉资之华人,特以沉香、吉贝易之耳”,“(黎族)无盐、铁、鱼、虾,以沉香、纁布、木棉、麻皮等就省地博易,得钱无所用也”。黎汉人民之间的贸易方式多以物物交换为主,如“省民以牛博之于黎,一牛博香一担”,黎族人民先与岛上的汉族商人进行物物交换,然后这些物品再由汉族商人转运到大陆或者其他地方进行销售。

1.3 宋代黎、汉贸易的特征

宋代是海南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黎汉贸易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黎、汉之间贸易的主要特征有:一是贸易品种更加丰富。赵汝适《诸蕃志》中关于“海南”的条目中提到了二十多种物品,如“沉香、蓬莱香、鹧鸪香、笈香、生香、丁香、槟榔、椰子、吉贝、苧麻、楮皮、赤白藤、花纁、黎帛、青桂木、花梨木、海梅脂、琼枝菜、海漆、萆拔、高良姜、鱼鳔、黄腊、石蟹等”,其中大部分是黎族人民的产品。汉族贩运给黎族的商品也有铁器农具、酒米鱼盐、金银器皿等。二是贸易总量提升。由于史料获取的困难,我们暂从宋代海南的商税变化来窥视宋时黎汉贸易的总量的提升。根据小叶田淳在《海南岛史》中的记载,熙宁(1068年)之前,海南四军州的商税总额大约为4428贯,而在熙宁十年(1077年)之后,海南的税额总量猛增至38922贯,增加了8倍有余,尽管其中不完全是商贸总额提高的共享,但是从商贸总额提高所占的比例也足以反映黎汉贸易总量的提升。三是贸易范围扩展。在宋以前,由于道路不通、黎汉交往不足以及其他原因,黎汉贸易主要在一些重要的州县开展,但是随着宋代海南的开发,黎人为患,道路不通的局面得到改观,越来越多汉族商人深入黎区开展贸易,越来越多黎族人民来到

汉族聚居区进行交易。如《诸蕃志》记载,“熟黎之外,海南四州军镇,其四隅地方千里,路如连环”。以往只有少数商人为了厚利不顾安危而深入黎区,随着经济发展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许多州县出现了墟市以供交易,一些虽然远离城市但是水陆便利的村落也有许多汉族商人设置商铺进行贸易,而且越来越多汉族商人愿意深入黎峒进行交易,如《岭外代答·香门》中记载,“省民以牛博之于黎,一牛博香一担”。不仅汉族商人越来越多前往黎区,黎族人民也逐渐走出来,前往汉人居多的州县进行贸易。据《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记载,“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焉”。

2 宋代黎、汉贸易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多民族共同体,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助、荣辱与共、不可分割的伟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各民族的历史进程^[1]。黎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吸收、融合了许多民族的历史基因,形成了包含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内涵,具有强大张力和吸纳力的民族综合体。宋代黎、汉贸易的过程包含着交往、交流的内涵,甚至出现彼此间部分融合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各民族互动的必然结果,是黎族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中形成的历史主流。

2.1 黎、汉贸易促进民族经济交往

一般认为,民族交往是民族生产生存的基本方式,是民族间往来互动和族际关系协调的过程^[2]。其中经济交往是民族交往的主要方式,商业贸易又是经济交往的主要方式。有宋一代,随着宋王朝治黎方略的合理,黎族经济社会得到了巨大发展,黎、汉之间商业贸易的品类增多,总量提升,范围拓展。大量汉族商人进入黎族聚居区开展贸易,许多黎族人民也不再局限在黎峒等待汉族商人的到来,而是走出黎区,进入汉族聚居区开展贸易。随着黎、汉贸易的发展,黎族和汉族的经济交往更加密切,双方交流增多,互信增强。这从黎汉经济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商业信用与商业行为中便可窥见,“(黎族)与省地商人博易,甚有信而不受欺,商人有信则相与如至亲,借贷亦所不吝”,汉族商人与黎族人民交易也“不敢负其一钱”。

2.2 黎、汉贸易促进民族文化交流

民族交流是民族关系的具体内容,是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正面交往。^[3]随着黎、汉贸易的发展,黎族和汉

族文化上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双方对于对方文化的学习和应用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交流表现在:一是民族间语言文化的学习交流。如《岭外代答》中记载的“黎人半能汉语”,可见为了更好地进行经济贸易活动,许多黎人学习汉族语言。二是民族间服饰文化的交流,许多黎人在进行贸易时要“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焉”,可见服饰文化的交流也是黎汉贸易发展的一个结果。

2.3 黎、汉贸易促进民族命运交融

民族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的最终结果,是各民族生息相关、命运与共的表现。黎、汉之间的贸易,推动了黎族与汉族的经济交往、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增强了双方互信,拉近了心理距离,最终朝着打造命运共同体,塑造文化认同感的方向发挥作用。海南黎、汉之间的贸易就像一颗小石子,仍进了黎、汉民族关系的湖泊之中,激起了一圈圈的涟漪,推动黎、汉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随着黎、汉民族关系的发展,黎族中经济发展相对先进的所谓“熟黎”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大量进入省地耕种,贡纳赋税,生产生活几乎与汉族无异。同时,随着汉族人民迁入海南,其中包括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差的汉族,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提到的“琼崖儋万,民既贫苦,仍出役钱,其间大半贫困,不曾输纳,甚者逃入黎峒”,也有许多贬谪官宦和商贾“入黎地种耕不归”,黎汉之间逐渐形成杂剧共处的局面。如谪居海南的苏轼曾写下,“琼崖千里环海中,民夷错居古相蒙”的诗句。随着黎、汉人民生活上的逐渐交融,其将逐渐共同面对自然灾害、共同面对政治变动、共同面对其他事件,逐渐在命运上具有了休戚与

共的特征。

结语

宋代海南的黎、汉贸易只是黎、汉民族经济交往的一个截面,在宋代以前黎族和汉族的经济文化的交往交流便已开始,民族交融也有出现,但宋代是双方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新时期。这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大陆上大量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人民迁往海南,为海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以及劳动力。加之宋王朝对海南黎族的“羁縻政策”,黎族的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巨大进步。同时由于宋代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的发展,海南作为还是贸易的一个重要节点,其地位之重要性更加突出,海南不仅是重要的物产产地,也成为了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下,海南黎族与汉族的经贸交往日盛,在贸易这一纽带之下,黎汉两族人民加深了了解,增强了互信,相互学习对方的优秀文化和技术。黎、汉两族,通过经济交往增强了文化交流,形成了杂居共处的局面,逐渐成为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高永久,赵志远.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J].思想战线,2021,47(01):61-70.
- [2]罗彩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03):22-26.
- [3]马瑞雪,李建军,周普元,李蕾.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02):35-46.